

当然，众所周知，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和尽善尽美，它有过挫折和失误，曾受右的或左的、但主要是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应引以为戒。但是，正如小平同志在《祝辞》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其成绩所以显著，正是由于《讲话》精神的指引，是由于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方向。文艺为人民服务是《讲话》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文艺领域的运用，也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在文艺事业中的贯彻与实践。今天，我们纪念《讲话》发表50周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继续坚持和更好地实践《讲话》的基本思想——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文学生命的永恒火种

陈 美 兰

《讲话》发表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如果说，从40年代至50、60年代我国文学在与人民结合的广阔道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已经昭示了这一理论文献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里程碑意义；那么，新时期10多年的文学实践，再继续确证着《讲话》的基本精神，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及未来走向，仍然发挥着重大的指导性力量。

新时期序幕拉开不久，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致《祝辞》中，就精辟地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命题：“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接着又确定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指针。这正是邓小平同志对《讲话》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又鲜明地体现了现阶段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因而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活力。

回顾近10多年的文学创作道路，我认为起码有三个重要方面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首先是文学与人民事业取同一步伐问题。刚跨进新时期，我们的文学迅速地参与了批判、清算“四人帮”祸国殃民罪行的伟大斗争，大胆揭露了动荡的文革十年给国家人民生活留下的创痛，并由此而对我国近数十年来所走的历史道路进行深沉反思，重新追寻几十年革命斗争所凝聚的精神财富，出现了象《光的赞歌》、《丹心谱》、《人到中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一批具有较强思想、艺术震撼力的诗歌、戏剧、小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唤起强烈共鸣。当中国的改革大潮刚刚掀起，文学又成为这个历史潮头的牵动力量。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乔厂长上任记》这样一大批充满激越情怀、反映亿万人民振兴祖国热望的作品，以及它们所引起的社会震动。确实，当文学事业、当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严肃的使命感保持着和人民命运息息相通时，我们的文学事业就成为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会在亿万历史创造者心灵中显示出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量。但是，也曾有这样的情况，在一种所谓文学“向内转”，“不屑于作时代的传声筒”口号的诱惑下，文艺领域出现了一些疏离现实、漠视人民火热斗争，只求表现“自我”，甚至到原始洪荒世界去寻找创作灵感的作品。事实上，这样的创作成品，究竟有多

少能真正走进读者心灵?更不用说它的生命力了。是与人民事业同步前进抑是与人民事业主动疏离,两种不同的实践结果形成的强烈反差,再一次警示我们应牢记毛泽东同志在《讲话》的谆谆告诫:一切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只有投身到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从那里吸取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把自己当成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这是文学获得生命力的唯一保证。

第二是文学如何处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问题。进入新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路线的恢复,为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动力和人文环境。文学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揭示生活矛盾,为克服社会前进的障碍,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小说、报告文学方面,出现了一些颇具深度的作品。但毋庸置疑,确也有一些作品存在某种失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矛盾,如何在创作中处理好光明面与阴暗面、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关系问题。这10多年来我们围绕着某些作品从较早出现的《苦恋》到前几年出现的《血色黄昏》所展开的激烈论争,其焦点往往就在于此。关键的问题是,能否坚持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讲话》中指出的那种辩证态度: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的历史创造者,对于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革命事业,文学创作首先应该是歌颂;固然,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也可以批评,但应从爱护人民的立场出发去批评;生活中的黑暗,可以暴露,但应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阶级斗争虽还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因此,文学创作接触的生活矛盾大量的必然是我们事业前进中所遇到的各种曲折和问题,是我们人民内部的碰撞,是人民群众在改造旧世界过程中对自身的改造问题。在这样新的历史情势面前,更需要我们对生活矛盾有一种辩证的把握能力,更会体会到《讲话》精神的深远作用。在建国后的前17年中,我们有过片面理解《讲话》精神的教训,某些创作不敢揭露矛盾,不敢正视生活中的阴暗面,粉饰现实,自然受到历史的淘汰。而近10多年文学创作实践中的某些失误,也在促使我们应该从另一个片面中去吸取教训,也就是在艺术表现中正视局部黑暗时不忘整体的光明感,表现邪恶嚣张时不忘生活中的正义气势,为挫折、失败而悲歌时要激起人们对社会主义、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无限信心。

揭示矛盾和展示理想,正视前进中的荆棘又给人以前进的勇气,这是社会主义文艺最重要的精神特征,实际上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文学上的体现,既深刻揭示历史真实存在,又科学把握人类历史未来。应该说,新时期10多年的文学实践,为体现这种精神特色已走出了坚实的一步,如果我们在创作中更自觉地把握表现生活矛盾时的辩证思想,必将使文学在我们的人民走向文明进步、走向社会主义未来的途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是关于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创新。文学形式、艺术方法的大胆探索与创新,是新时期文学发展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随着国门的开放,西方各种现代艺术流派大量涌入,在文学领域引起巨大的骚动,也为创作的借鉴提供了新的客观条件。新时期文学对外来艺术经验所持的开放态度并在吸取融合中所取得的实绩,是不应低估的。从最早开始对意识流手法的尝试到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到荒诞、黑色幽默等手法的引进,确为我们的文学增添了不少新颖、奇特的色彩。

对于文学的借鉴,《讲话》早有明确的论述:“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而另一方面,“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近10多年文学探索的一系列成功的或不太成功的或失

败的实践可以说是对这个思想原则的至理性的又一次有力验证。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曾有一些意作“先锋”的探索者，极力想以某种“硬搬”方式制造“新”作，以趋附世界“新潮”。可是由于脱离国情、脱离本土文化根基，离脱本国广大百姓的欣赏习惯，结果，这样的文学只能在极小的文化圈子内孤独地徘徊，始终难以获得众多的接受者。探索中的这种曲折，不得不使“先锋”者们重新思索，走出“死胡同”摆脱孤独的困境，当然，还会从中获得清醒的自觉。确实，当我们真正做到对外来文化的融合与超越，真正着意于创造具有当代色彩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中国文学才能真正获得新时代的广大读者，也才能与世界文学获得沟通。

新时期文学10多年的发展证明，中国文学能新的历史阶段保持着勃发的生命力，中国文学能以自己鲜明的特色走向世界，贡献于人类，能否自觉地坚持和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是个关键问题。诚然，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它是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自然会有某些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所以，必须随着新的历史实践继续丰富、补充和发展。但它那基本的思想原则则是永恒的，是文学生命的永恒火种。

（上接第49页）

注释：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5、613—614页。
- ②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17页。
- ④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页。
- ⑤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2页。